

第14章

兩個革命之間：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

馬意莉 (Elizabeth McGuire)

1950年代和60年代留學蘇聯的中國學生作為「新中國」的顯赫代表，與「蘇聯社會主義」中的普通人、各級機構與環境格局進行着直接互動。就字面意義而言，他們的任務是掌握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發展至關重要的蘇聯技術。但是，他們也起到同樣重要的象徵作用：他們的工作是在個人層面造就中蘇「友誼」。儘管1950年代中蘇關係還在黃金時代，這也並非易事。

一方面，1950年代是中蘇兩國正式建交的開始，但就人事而言，則延續了過去30年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親密而又波瀾起伏的關係。1950年代負責教育交流的大多數中國人本就是1920年代的留蘇學生，他們對蘇聯的回憶，成就、建構但又限制了年輕一代的經歷。他們確保了留蘇中國學生通過精心選拔，他們的關注也使這些學生在國內和蘇聯都具有崇高地位。另一方面，蘇聯當局也急於展現蘇聯最好的一面。然而，他們對外國學生的管理遠不及中國方面那麼集中和高規格，這就意味着中國人對蘇聯社會主義的體驗各不相同，而且很不平衡。有些中國學生覺得他們還沒看夠蘇聯的現實，而另外一些學生則覺得他們或許已看得太多了些。

中蘇兩方的領導都使教育交流所設定的現實目標和象徵目標變得更為複雜，與此同時，中國學生也發現他們正面臨着歷史本身所造成的挑戰。不論歷史上中國革命者與蘇聯有多麼深的淵源，兩國革命仍有着不

同的發展進程：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系統，蘇聯共產主義比中國變體年長30年。中蘇教育交流計劃認為這一「年齡差距」是機遇，而非障礙。即使中國學生那些最微不足道的行為——親吻姑娘，拼命備考，鄉村消夏——也是在拉近兩國革命之間的距離。他們的困難（以及那些試圖規範他們的領導們所面臨的困難）恰恰強調了不同的革命進程如何使得國際社會主義陣線的實際操作成為問題，如何使中國革命的成功與當代蘇聯社會主義保持一致成為問題。事實上，我們可以認為，留學蘇聯的中國學生同時經歷了中蘇聯盟中固有的現實張力與象徵性張力，這些張力將會在終結這一教育計劃的中蘇分裂中最終顯現。

當中國留學生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開始回國時，他們發覺他們的專業技能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擱置了。然而，很多人仍然繼續在技術管理和政治領導的位置上工作，在這些領域中，留蘇學生的比例遠高於其佔中國受教育總人數的比例。如今，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退休，帶着驕傲、迷惑與懷舊的心態，在平靜中思考着他們在中國發展和國際社會主義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定義「中蘇技術轉移」

1946年，一位名為任湘的20歲青年被毫無準備地派去哈爾濱一家紡織廠做廠長。任湘的父親任作民，湖南人，是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任弼時的堂兄弟，曾於1921年赴莫斯科學習，是第一批留蘇中國學生中的一員。在延安的時候，任湘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他夢想着有朝一日能像父親和其他幸運的延安孩子那樣去蘇聯學習，不過他最後在延安的自然科學學院就學。²他在那裏所學的知識非常粗淺，卻已是當時中共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科學教育了。1946年他任廠長的時候，這些知識遠不足以去管理一家紡織廠。任湘不得不依靠其下屬的專業技能來完成工作。他覺得自己太年青，太笨。³任湘認為這是他個人的缺點，不過缺乏科技教育對整個中國共產黨而言也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在困境中，任湘寫信給東北局財經委員會領導人李富春和陳雲，要求去學校學習。出乎意料，很快就有人被派來接替他在紡織廠的位置，而任湘自己則接到指示去哈爾濱。在哈爾濱，黨組織給他發了一套西裝和一雙皮鞋，並告訴他，他就要去蘇聯學習技術了。他脫下了軍裝，卸下了槍——開始擔心自己還不會說俄語。⁴

1948年9月，任湘和其他20名中共高級領導的子女離開哈爾濱去了蘇聯——他們是從戰爭開始以來第一批去蘇聯學習的中國共產黨員，也是第一批去學習技術而非意識形態和軍事的留學生。⁵

從1948年到1963年間，中國將大約8,000名學生送到蘇聯的大專院校學習——佔此期間中國留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八十。⁶ 1950年代末，蘇聯的外國學生中將近一半是中國學生。⁷ 大約三分之二的學生所學專業是理工科；軍事、政治、藝術和人文學科的學生相對較少。⁸ 這一規模宏大且昂貴的留學計劃是中蘇雙方致力於技術轉移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技術轉移建立在一個假設前提之上，即中國革命能夠也將會與戰後蘇聯向社會主義技術官僚統治發展的趨勢保持一致。這一留學計劃⁹是中蘇「友誼」的具體證明，與過去研究較多的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的計劃相互平行。¹⁰

然而，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所面臨的挑戰與可能性與在中國的蘇聯專家所面臨的截然不同。專家在當時就能產生影響，而中國學生所受的蘇聯教育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結果。他們必須先學俄語和數學，才能掌握基本的工程學，更別提先進技術了。專家和學生之間（學生與其他訪蘇人員如外交官、政府官員或者代表團成員之間）的另一個差別是，學生將在蘇聯受教育——使他們的心智按一定方式發展定型。中蘇雙方都決心控制蘇聯通過這些學生對中國施加的影響。

中蘇兩方面都認同一點，教育應該是技術的。學生學習的專業顯示了蘇聯對中國影響的真正性質。若學生在各專業平均分佈，則意味着對蘇聯認識論的普遍強調，或許也意味着承認所有專業都能革命化，因而蘇聯模式必然優於中國模式。另一方面，如果只是精心挑選一些對中國經濟發展至為重要卻又不能在中國學到的重點學科，則意味着有較功利的規劃。

而事實是兩者的混合：儘管重心明確在科技上，中國學生仍然廣泛學習着各種知識，從牲畜管理到電影製作。¹¹ 1956年，李富春砍掉了許多專業選擇，例如營養學、衛生、教育及圖書館學，並命令學生放棄那些能在中國的學校或由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幫助而學到的專業。¹² 此後，越來越強調選擇在中國無法學到的專業。¹³

顯示中國意圖的另一個指標是派送學生的平均年齡。起初，高中畢業生佔公派留學生的大多數，但是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後來居上，最後研究生成了大多數。這似乎是想顯示，中國的教育體制和人力資源發展得如此之快，以至於已經不必再派送年輕人出國上大學了。他們以為這個一次性的蘇中技術轉移（一個比「大躍進」更早失敗的大躍進）能夠迅速有效地實現。¹⁴

儘管規劃中有很多現實考慮，中蘇兩方面卻又都致力於控制教育交換中具象徵性和代表性的元素——並為其難於控制而煩惱。學生不像訪蘇的其他遊客，他們要在蘇聯待很長時間，而且廣泛散佈在普通蘇聯學校中。無論當局有多努力試圖影響和設計這些學生的經歷，無法預計的環境迫使學生作出創造性的回應，並自發地重新詮釋中蘇關係。

衡量留蘇學生歷史重要性的一種方法是研究他們在回國以後幹了些什麼。我們會看到，其中大部分從事研究和學術工作（被文化大革命中斷），他們最終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中所佔比例，遠超過當年在留蘇學生中所佔的比例。但是對教育交換的評價不僅應從（蘇聯之）因（中國之）果關係出發，考慮其後來的影響，教育交換也是更大意義上中蘇關係的縮影，其重要的意義在於其發生之時。

前輩與回憶：

1920年代的留蘇學生與1950年代的教育計劃

1952年夏，在北京一所培訓留蘇中國學生的特殊學校，劉少奇作了一次演講。他直率地告訴學生，每個學生出國留學的費用相當於25個農村家庭的年收入總和，並鼓勵他們努力學習，將來學成回國報效祖國。他也介紹了自己的留學經歷。1921年，他曾在莫

斯科短暫學習過一段時間，對當時的經歷記憶猶新。他告誡學生：「要全面看待蘇聯，那裏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但也有看不慣的東西，如婦女帶項鍊、寶石戒指等，蘇聯也不是什麼都好，那裏也還有乞丐、小偷、醉鬼。」¹⁵

劉少奇是第一批去蘇聯訪問的充滿理想的激進中國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他在那裏學習了六個月。這批留蘇中國學生的先驅者不得不偷偷進入蘇聯，到了蘇聯以後也往往食物匱乏，穿着剩餘的紅軍軍裝和靴子。課程內容非常簡單，卻因為沒有翻譯，只能囫圇吞棗地理解。他們與蘇聯同學和其他外國學生基本上不存在私人關係，有時甚至互相敵視。黑市和賣淫猖獗的新經濟政策早期種種相互矛盾的現象，影響了他們對俄國革命的觀感。難怪劉少奇警告學生不要抱有烏托邦式的幻想。¹⁶

對中國學生在蘇俄的經歷，劉少奇還有另一個參考點：他的兒子劉允斌和女兒劉愛琴，在蘇聯一所專門培養國際社會主義者子女的特殊學校長大，並在戰後就讀於蘇聯的高等學府。在那裏，他們戀愛、結婚、生子。劉少奇命令他的兒子女兒回國，並禁止他們的配偶（一個是俄國人，另一個是西班牙人）隨行。這在親密無間的蘇聯和中國及兩個革命之間，劃下了分界線。¹⁷

1920年代，很多中共日後的領導人都在年輕時去過蘇聯留學，截至1987年，這些老留蘇學生還佔中央委員會委員總數的約7%。更令人矚目的是，這7%的人佔當時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受過大學教育人數的四成左右。¹⁸具有同樣顯著象徵意義的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都在1930和40年代把他們的親生孩子送到蘇聯去了。

現在這些早期中共領導人成了新中國的創建者，他們開始把這個國家的孩子送往蘇聯。¹⁹像任何望子成龍的父母一樣，他們試圖確保這些孩子跟他們自己當年相比，能獲得更好的照顧，也表現得更好，因此，領導人慷慨給予了這一教育計劃相當大的關注。1950年，在中共高層建立了一個三人小組，專門管理中國留學生，小組成員有聶榮臻、李富春和陸定一，他們都曾在1920年代末去蘇聯留學。他們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工作，而周恩來有時還親自給即將離開的留學生講話。²⁰劉少奇也密

切參與此事，在很多場合跟學生講話，甚至在很多細節問題上起決定作用。例如，教育部檔案中藏有一份劉少奇的親筆書信，顯示他正在仔細考慮兩個中國學生的成績是否好到有資格派去蘇聯學習。²¹

除了高層領導人的關注之外，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這些學生都是龐大且昂貴的公派留學計劃的焦點。一所特殊學校在北京建立，教留學生俄語，並幫他們準備出國的行程。²² 就當時中國的標準而言，這所學校的條件非常好。一個從外省貧困家庭來的學生回憶，他在學校的第一天曾經把早餐提供的兩個饅頭藏到口袋裏，打算留到以後吃；在此之前他從沒一天吃過三頓飯！²³ 可是，奢侈花費與嚴格監控同在：教育部和外交部合作，為挑選和準備留學生制訂了一系列規章制度，詳細到最私人的細節。相應的，市政府和省政府都建立了專門的領導班子，實施這些規章。到 1955 年止，僅僅在上海一地，就有 103 位全職人員和 68 位兼職人員，專門用來選拔留學生。²⁴

結果，1950 年代留學生的經歷與 1920 年代老一代留蘇學生迥然不同。劉少奇必須跟幾個朋友偷偷穿越國境去蘇聯留學，而 1950 年代的留學生成群結隊地去，坐滿一節節火車車廂，有時甚至是整列火車，在象徵中蘇友誼新樂章的「莫斯科—北京」嘹亮樂曲聲中到達莫斯科。²⁵ 劉少奇當年不得不穿着蘇聯紅軍的舊軍裝，而 1950 年代的留學生，有的在出國前就獲得了能供五年用的衣服，還有日常需要的各種東西，甚至包括牙膏。²⁶ 劉少奇和他的同學也許會因為太餓而無法專心學習，而 1950 年代的學生有時候卻因為不喜歡食物的口味或者為了省錢買其他東西，自己選擇不吃飯。²⁷ 如同從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來的學生一樣，在蘇聯的中國本科生每人每月有 500 盧布的津貼，研究生有 900 盧布；作為精英的團校學生，每月津貼則高達 1,200 盧布，比當時毛澤東的工資還要高，花不了的錢太多，他們還能買些貴重物品，比如照相機。²⁸ 如果學生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好運氣，1920 年代的老留學生，比如劉伯承，就會在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提醒他們，當年在蘇聯的生活曾經艱苦得多。²⁹

另一個重要差別在於 1950 年代留學生的政治地位，這一點劉少奇不可能提到。1920 年代的留學生是熱情的國際主義者，對他們而言布爾什維克黨不論是理論上還是事實上都是無比強大的；而 1950 年代的留

學生儘管被鼓勵去尊重蘇聯統治，卻明確由中國政府來管理。在1920年代，留蘇中國學生常常受布爾什維克黨反覆無常的擺布，甚至被捲入派系鬥爭，落得悲慘下場。當他們遇到麻煩時，沒有自己的政府當局為他們撐腰。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在起初的困難時期之後（最初一批21位中國學生在1948年到達蘇聯，他們被送到遠離莫斯科的學校，以防激怒國民黨政府），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正式外交協議，規定了交換學生的章程制度，蘇聯向中國收取學生留學費用的一半。³⁰如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設立了一個專門的官方部門，以便管理留學生。³¹

此外，中國留學生還能看到中國的報紙和雜誌，定期聚會進行政治學習，後來甚至有定期回國進行政治學習的。³²在這種情況下，不可想像1950年代的留學生還會像他們的父輩那樣組織起親蘇派別。與此同時，蘇聯的政治情況也有所變化。當中國留學生在1960年代公開發表反蘇言論時，蘇聯當局只是在高層監視這些發展，從未單獨懲罰過任何一個學生，而1920和1930年代的蘇聯政府則流放和槍斃了不少中國托派分子。³³

然而，1950年代的中國留學生雖比1920年代的學生更安全，卻也更不自由了。中國領導人異乎尋常地熱衷於控制留學生的個人行為，結果使新一代留學生的經歷與他們自己的經歷截然不同。1920年代在莫斯科放蕩的學生生活為他們回到中國後的傳奇增添了不少素材；婚外戀和與俄國女子偷情司空見慣，因此而誕下了幾十個私生子。當這些革命父母回到中國後，這些私生子大多被留在了莫斯科。1920年代留蘇中國學生羅曼史的背景，正是激進中國青年對俄國革命的普遍浪漫化。³⁴

如今，這些1920年代的革命者都已經成長為自己國家的領袖，他們開始限制中國青年在蘇聯所受的情感影響：他們從一開始就被禁止戀愛。儘管這種禁令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十分普遍，中國似乎尤其明確而且嚴格。1948年，當第一批21位學生出發時，深知底細的長輩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誡他們：「學習結束前不得談戀愛。」³⁵所有正式頒布的規定都反覆強調這一禁令，「在學習期間最好不要戀愛結婚」是比較溫和的說法。³⁶另一個規定說：「為了集中全力完成學習任務，對戀愛問題應自

覺約束，正確處理，在留學期間不准結婚。」³⁷ 無論以何種措辭，所有的學生都明白這一規定。劉少奇甚至用他自己兩個孩子的經歷來強調，以免學生還有不解之處。

當然，不是所有 1950 年代的中國留學生都一直遵守這一規定。事實上，有些人甚至在蘇聯就和其他中國學生結婚了，領了蘇聯的結婚證，中國當局也沒找他們麻煩，尤其是當他們在學業快結束時才結婚的話。³⁸ 但是，和外國人的戀愛關係則很成為問題。中國男子覺得俄羅斯和猶太女子（越年輕越好，有些中國大學生甚至追求高中女生）特別漂亮——「好像洋娃娃」。他們相信蘇聯女子也被他們所吸引，因為他們比一般俄羅斯男子更加忠誠、勤奮、頭腦清醒。³⁹

任湘，我們之前談到過的 1948 年留學生，仍然對他在回國時拋下的俄羅斯女友記憶猶新。「差一點結婚了。」他回憶道，「俄羅斯姑娘，她特愛我，可惜我不敢帶她回來……對我特別好，不是一般的好……後來她就提出來，我愛你，我說我也愛你，可惜我沒辦法。她說怎麼沒辦法……後來她到我那個姐姐那裏去哭，『我愛他，他為什麼不理我。』我姐姐說不是不理你，是我弟弟講了，我們中國有規定，不能帶……最後因為我到快畢業的時候，經常來看我，擁抱我，吻我，我都動都不敢動，我說我不行，你別那個……」⁴⁰

任湘能夠抵擋俄羅斯女子的魅力，不過也有人不行。他們的故事如今成了年逾花甲的留蘇男學生中的傳奇。一位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告訴我，他有一位同事和一個蘇聯女子結婚，並把她帶回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她無法忍受這裏的生活，離開他回蘇聯去了，並再次結婚。1980 年代，這位留學生去蘇聯旅行，卻不肯去列寧格勒，因為他曾在那裏學習並結識了他的前妻。他仍然深愛着她，並希望他的朋友給她帶信，但是他害怕親自去見她，不願面對她與她軍人丈夫的新生活。⁴¹ 在一個類似的因地緣政治分裂而婚姻破裂的例子中，一位俄羅斯女子離開她的中國丈夫（曾是留學生）和他們的兒子，在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回到了莫斯科。他們認為只要過幾年就能團聚，可是他們直到十年以後才重新建立聯繫，等到那個時候，這位丈夫已經失明了。⁴² 在另一個例子中，一位在 1950 年代娶了俄羅斯姑娘的男人決定不回中國，並得到蘇聯當局的幫助留

了下來，但是中國政府決心抓住他；他最終死於一場可疑的火車事故。⁴³

時運不濟的戀人們被捲入中蘇關係的漩渦中，他們的象徵意義引起高層的注意。1961年8月，一份克格勃向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描述了1956年列寧格勒大學一位年輕的俄羅斯學生與一位中國姑娘相識相愛的情況。這一事件很不尋常，牽涉的是俄羅斯男子和中國姑娘。這段羅曼史被上報中央委員會審批，因為這位男子被派去邊境城市，那姑娘在邊境的另一邊等他，並通過「莫斯科—北京」列車上的乘客給他傳口信，說她會偷越國境。當他們的計劃被發現後，那男子威脅說，如果他們不能團聚，他就要和愛人一起殉情自殺。克格勃為此建議中央委員會，如果該男子獲得中國政府允許進入中國，蘇聯可以允許他離開。⁴⁴

這對不同尋常的情侶最終結果如何，已無從知曉。不過既然連劉少奇自己的孩子都不被允許把異國配偶帶回國，恐怕他們不太可能說服中國政府。不管中國學生受到多少鼓勵去跟蘇聯人交朋友，把他們當成兄弟，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把蘇聯人當情人了。

規格高，壓力大：蘇聯接待新一代中國精英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大學，向幾千位等了一整天的中國學生講話。隨同他一起出訪的代表團成員還包括鄧小平、彭德懷和其他高層，但是學生想見的就是毛澤東。穿着軍裝的軍事留學生坐在莫斯科大學大禮堂的前排，還有一部分坐不下的學生在其他小一點的房間等候毛澤東接見。他們等了幾個鐘頭，而且據說毛可能不會來了。

毛澤東最後還是來到了禮堂，他想要坐下，不過學生就是不讓他坐下。他們聽說他有時候一次演講會說兩三個小時，於是期待着這次演講會成為一場盛大的表演，可是毛只講了半個鐘頭。「世界是你們的。」他說，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發「世界」這個詞，學生沒聽懂，他用英語重複了一遍，可是還有些學生不懂，他便問陪同的駐蘇聯大使「世界」用俄語怎麼說。「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後來他對學生說，要勇敢，又要謙虛，祝大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